

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 
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 
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

# 每一个党员必须向群众负责

本报记者 赵婷婷

提示  
SHI  
SHI

1956年9月,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,这是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党的八大通过的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指出,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,因此特别应当注意谦虚谨慎,戒骄戒躁,并且用极大的努力在每一个党组织中,在每一个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中,同脱离群众、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。

## 一切从实际出发

盛伟民戴着一副花镜、盯着桌上一本厚厚的社区志,阅读停顿之处,还不时地添上几笔。看到记者进来,他摞下笔,摘掉眼镜,展了展衣襟,招了招手。

这位头发有些花白的“老头儿”有着多重身份,是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罗星街道和合社区文化礼堂的理事长,是社区文艺队的带头人,是和合村村干部,也是《和合社区志》的主编。

400多页的《和合社区志》里,名为“和合调查专记”的篇章占据了全书的五分之一。“这一章很重要,它记录了60年前中央调查组到和合生产队开展农村调查的历史。”盛伟民说,“那次的浙江调查足足有100天。”

“和合调查”始于1961年1月。关于开展此次调查的背景,还要从党的八大说起。

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作修改党章报告时明确阐述,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,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、向群众负责、遇事同群众商量、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。同时,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,取决于能否采取“从群众中来,到群众中去”的

工作方法。

1957年,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,提振了党和人民继续建设社会主义的磅礴气势,但同时,部分领导干部滋生骄傲自满的情绪,忽视经济规律,急于求成。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苦于蛮干,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,也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。从1958年11月开始,党中央领导全党作了许多努力,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。

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,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,毛泽东号召全党,一切从实际出发,从人民群众的实际出发,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、调查研究年。随后,中央组织3个调查组,分赴浙江、湖南、广东农村开展调查。从中央到地方,各级领导干部纷纷走出机关,深入基层开展典型调查。

中央派出的调查组之一——由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带队的调查组,来到当时位于浙江省嘉善县魏塘公社的和合生产队(今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罗星街道和合社区)。

## 帮助人民解决困难

《和合社区志》中的“和合调查专记”,记录了一位名叫“王老五”的人物。“关于王老五,说来话长。”盛伟民说,王老五是当时和合生产队第四小队的村民,“1960年,他们一家7口挤在一间12平方米的草房里,日子过得很难。中央调查组专门到他家了解过情况。”

和合社区文化礼堂二楼建有“田家英和合调查展室”,详细记载了那段不寻常的日子。展室里还有一份根据王老五回忆整理的笔记——

1961年,王老五家。1张竹垫、1张地铺、3条被子;1只行灶、1张破桌、3条板凳。

王老五坐在板凳上,面对中央来的“大干部”,紧张得连茶水都忘了烧。“你不要有任何思想顾虑,把家里的情况、从生产到吃穿住用都实事求是地告诉我。”看出了王老五的顾虑,“大干部”和气地说,“我们来调查就是为了帮助大家解决困难的。”

其实,王老五这两天听到不少有关

调查组深入细致工作、和村民同吃同住的事情。眼前的这位“大干部”,就住在村民家现搭的“柴地铺”上。王老五打量着这位“大干部”,一身中山装,笑容和蔼,说起话来一点架子都没有,这让他放松下来,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家的情况。“大干部”边听边问边记,两人谈了3个多小时。

“王老五说的‘大干部’就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。”盛伟民说,“有一天晚上,调查组正在梳理笔记,生产队的干部觉得他们日夜工作太辛苦,特意拿了一小袋番薯来给他们加餐,被田家英拒绝了。他说:‘我们来这儿做调查,决不搞特殊,这番薯我们不能要’。”那时,盛伟民只有13岁,但这件事他一直记在脑海里。

正是因为这种同吃同住、不搞特殊的工作作风,让田家英跟村民们迅速打成了一片,成为大家信赖的“田同志”。

## 利于人民的都可以说

根据《和合社区志》记载,调查组在和合工作期间,要么住在村民家,要么住在生产队的抽水机埠房里。白天走访调查,晚上睡在一张用稻草搭的“柴地铺”上,直到小学放假后,调查组才搬进校舍里。

盛伟民告诉记者,调查组有一个工作原则,叫“敢想敢说不敢做”。“敢想敢说”是指敞开心扉,只要是有益于人民的,什么话都可以说,什么意见都可以提;“不敢做”则是不对地方工作指手画脚,随意指挥。

在和合,调查组走遍了生产队的各个角落,与村民、干部促膝座谈,收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,基本上掌握了生产队的全部情况。此次调查最终形成了一份4万余字的调查报告,向党中央传递了大量地方信息,毛泽东当即就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提出意见。这份调查报告还促进了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(草案)》(以下简称《农业六十条》)的出台。《农业六十条》颁布后,率先在和合生产队展开试点工作。资料显示,和合

生产队的变化立竿见影:过去白相(玩耍)人多,现在劳动出勤的人多;过去上街看戏多,现在上街积肥多;过去荒地白田多,现在开荒绿化水面多……随着《农业六十条》在更大范围内实施,“到了1962年,嘉善县的农业生产恢复到了正常年景。”盛伟民说,“这一年,全县农业总产值达到2628万元,比上年增长25.5%;粮食总产量13.87万吨,比上年增长41%。”

此后几年,嘉善县的农业生产不断发展,农村形势日益好转。到了1965年12月田家英回访时,农民生产生活情况已经大有改观。

大规模调查研究活动,对于摸清经济方面的实情,作出实事求是的政策调整,克服严重困难,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同时,通过深入调查研究,也使党员干部更直观、更深切地认识和掌握了“从群众中来,到群众中去”的工作方法,在思想和作风上更加坚定地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。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 
辽宁日报大型融媒体策划

# 人民至上

## 根基

史说  
SHI  
SHUO

##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

始终坚持人民至上,是中国共产

党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。贯彻这一理念的根本工作方法就是要切实执行党的群众路线。党的八大把贯彻执行群众路线,作为执政党必须着力解决的历史任务。

八大通过的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,将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进行了专门论述和强调。这也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“群众路线”写入党章。具体内容如下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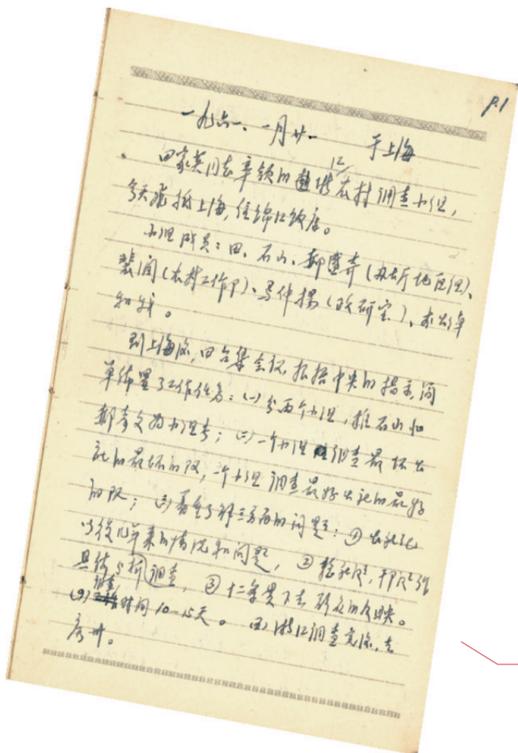
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主张的实现,都要通过党的组织和党员在人民群众中间的活动,都要通过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的自觉的努力。因此,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。党的领导能否保持正确,决定于党能否把群众的经验和意见,经过分析和概括,系统地集中起来,变为党的主张,又经过党在群众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,变为群众自己的主张和行动,并且在群众的行动中对党的主张加以检验、补充和修正。党的领导的责任,就是要善于在这个“从群众中来,到群众中去”的无限反复的过程中,使党和群众的认识不断地提高,使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地前进。因此,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党员必须同工人、农民、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民建立广泛的密切的联系,并且经常注意扩大和巩固这种联系。每一个党员都应理解解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,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,都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,遇事同群众商量,倾听群众的意见,关心群众的痛痒,尽力帮助群众实现他们的要求。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,因此特别应当注意谦虚谨慎,戒骄戒躁,并且用极大的努力在每一个党组织中,在每一个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中,同脱离群众、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。

这是对“从群众中来,到群众中去”这一群众路线的根本方法的概括和阐述,是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项重要理论成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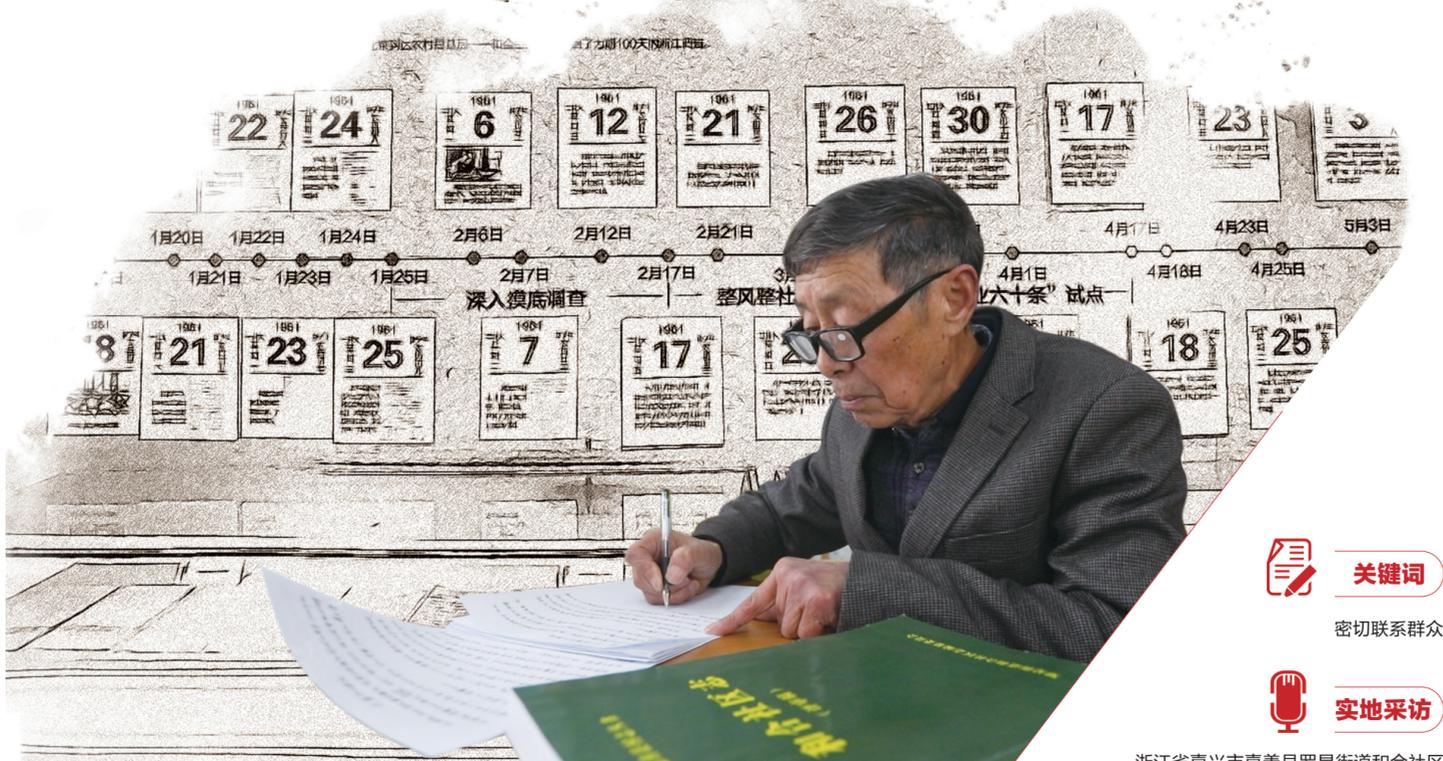
本报记者 赵婷婷 整理



扫码参观和合调查展室



嘉善县档案馆保存着调查组在和合调查时的工作笔记。



盛伟民是和合村村干部,也是《和合社区志》的主编。

本报记者 黄瀚博 摄

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罗星街道和合社区



关键词

密切联系群众



实地采访

本报记者 黄瀚博 摄